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07

约翰·厄普代克小说《恐怖分子》中的 他者叙述与主体建构^①

曾艳钰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厄普代克在其作品《恐怖分子》中采取了“他者”视角的叙述方式,在这种叙述中,信奉伊斯兰教的艾哈迈德既是恐怖分子的“他们”,即行凶者,又是受害者,即“我们”。因此,这种叙述方式模糊了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似乎消解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在这看似消解的过程中,杰克的主体性身份也得到了构建。因此一个更大意义范围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被构建出来。

关键词:厄普代克;《恐怖分子》;他者叙述;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1-0033-06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John Updike's *Terrorist*

ZENG Yan-y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y empathizing with the Other, John Updike attempted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terrorist's perspectives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What is striking about the explorations of the terrorist Ahmad's mind is the way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blurs together.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y* the terrorist and *We* the America seems to be dissolved, too. But Jack's self-identit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Ahmad and a wider circle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elf, i. e. Judeo-Christian American ideology, and Other, i. e. American Islam, appears.

Key words: John Updike; *Terrorist*; Other;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9·11事件后,最早对9·11做出回应的是政治家、哲学家及评论家,“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都去哪儿了?”这种质疑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以文学想象的形式再现9·11事件及意义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昭示出文学想象再现9·11的艰难。在经历短时间的“沉寂”之后,美国作家也开始对9·11事件做出了回应。厄普代克素以擅长描写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危机而著称,因此,当他的9·11小说《恐怖分子》(*Terrorist* 2006)出版后,自然引发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自11岁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高中毕业后,在他的伊斯兰教老师阿訇拉希德等人的指使下,意欲炸毁新泽西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最终,在他的高中辅导员杰克的劝导下,他放弃了自杀性恐怖行动。该小说出版后,虽然不乏好评,如认为厄普代克“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并书写当今时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1],是厄普代克多年创作中“最赋冒险色彩、非常值得一读的作品”^[2],但更多的是批评之声。约翰逊·拉班(Jonathan

① 收稿日期:2014-03-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13A025)

作者简介:曾艳钰(1967-),女,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Raban)认为厄普代克“未能理解伊斯兰基地组织反对西方的根源和特征”,未能成功表现伊斯兰教徒的愤怒^[3]。有评论认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只是“静态的单一维度的模式化人物”^[4];还有评论认为,厄普代克根本不认识艾哈迈德这个人,作品中的人物令人质疑,小说充其量只是达到“修辞上的真实”^[5];甚至有观点批评厄普代克“不明智地利用了关于某些事件的现成资料,写了一部拙劣的小说”^[6]。这部距离他前一部上榜作品《圣洁百合》(In the Beauties of Lilies, 1996)已有10年之久的作品似乎成为败笔之作。那么,该部作品究竟“败”在何处?与其他9·11小说不同的是,该小说采取了以艾哈迈德这个恐怖分子为叙述视角的“他者”的叙述方式,厄普代克显然步入了被布雷特霍特(Breithaupt)称之为的“书写9·11的禁区”:与同情9·11的劫机者无异。在布雷特霍特看来,这种同情不一定得是实际的支持,“但包括欣赏他们的激进行为,或者认同他们想象的动机”^[7]⁷⁹。厄普代克的确是有意识地采取了这种“越界”的、同情恐怖分子的叙述方式。本文认为,9·11之后很多美国作家陷入一种如何再现9·11这一历史真实的写作困境,厄普代克力图通过“他者”的叙述视角走出这一困境。在这种“他者”视角的叙述中,一方面,信奉伊斯兰教的艾哈迈德是恐怖分子的“他们”,即行凶者,另一方面,他也是受害者,即“我们”。因此,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也似乎消失了。而在这种对立看似消解的过程中,杰克的主体性得到了构建,因此一个更大意义范围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出现了。

1 后9·11时代美国作家写作的困境

9·11之后,“恐怖主义”及“原教旨主义”成为媒体及学院派关注讨论的高频词,如何再现后9·11时代的美国现实自然也成为美国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对9·11事件,媒体、期刊、报纸比作家做出了更快的反应。面对这一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真实事件,作家最一开始似乎难以接受其真实性。住在纽约的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看到电视上的画面,又从窗外看到浓烟时,不停地让自己在现实的想象与现实之间转换,因为他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总结说:“21世纪终于到来了。”^[8]³⁵他的文学作品也把9·11这天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小说《布鲁克林的罪恶》(The Brooklyn Follies 2005)中的情节发展止于恐怖袭击发生的这天。一些其他的作家则首先选择用非虚构的形式对9·11做出回应,如杰·麦克伊勒瑞(Jay McInerney)就是首先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记录9·11事件。对他来说,9·11彻底改变了纽约这个他所生活的城市及他作为作家的生活,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很难写出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在刚刚发生过灾难的纽约,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会被误读,恐怖袭击太真实了,小说不是一种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乔伊斯·欧茨(Joyce Carol Oates)也认为视觉艺术也许是一种回应9·11的更好形式:“电影应该是回应的最好的艺术形式,因为电影能捕捉到那个似乎是幻觉中的袭击的本质。”^[9]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也对作家能否“与灾难的事实保持一致”表示质疑。在9·11刚发生之后,小说无法反映出那种“无法摆脱的真实”^[10],比如那些在被劫持在飞机上和塔楼中的人,他们最后打的电话及所说的话,这都是现实发生的,但如果用虚构的形式模仿出来,就是对现实的一种不尊重。不过,麦克尤恩也承认,人们在通过看电视寻求安慰的同时,也开始把自己置于牺牲者的角色。“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在麦克尤恩看来,这个问题成为移情和同情的核心。换句话说,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成为众多小说家当时的选择,这也是迎合读者期待的一种方式。经历了集体创伤的读者一方面容易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小说中看到不断被构建的创伤,还期望圆满故事结局,这自然对小说家提出了挑战。

因此,很多9·11小说都以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创伤以及美国的反恐战争为主题,关注袭击带来的创伤后果,表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末日情怀。“创伤的中心辩证”和怀旧之情及语言间的断裂所产生的张力,成为美国政治及社会背景下的9·11小说非常典型的二元对立。而9·11小说究竟应该再现什么也成为9·11文学批评的关注点。对早期9·11小说的创伤书写,评论家不无焦虑,认为创伤书写有去政治化的作用,降低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麦克·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认为,作为一种阐释结构,创伤适合于保守政治和媒体策略,力图寻求解释及理解恐怖袭击的可控方式:“最让

人担心的是:只把创伤当作一种接受结构……实际上最终会不经意地强化在美国被压抑的自由-保守联合之间的共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其实是一种辩解。”^[11]^[15]实际上,指责9·11小说让9·11过于非政治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认为这些小说过于关注美国家庭及创伤的个体经历。潘卡吉·米莎(Pankaj Mishra)在论及肯·卡尔福斯(Ken Kalfus)的9·11小说《这个国家特有的混乱》(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2006)时表达了一种焦虑,“我们真的要用家庭纷争的主题作为再现后9·11美国的一种隐喻吗?除卡尔福斯外,德里罗和麦克伊勒瑞也是如此”^[12]。米莎的观点得到理查德·格瑞(Richard Gray)和麦克·罗斯伯格的认同,格瑞分析了德里罗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杰·麦克伊勒瑞的《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 2005)、卡尔福斯的《这个国家特有的混乱》以及克莱尔·梅苏德(Claire Messud)的《皇帝的孩子》(The Emperor's Children 2006)这四部作品,认为这些早期9·11小说“只是简单地把陌生的东西置于熟悉的结构之中。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一种家庭化的危机”^[13]。罗斯伯格呼应了格瑞的观点,他期望能看到一种注重“国际关系及疆界外公民身份”的小说^[14]。从米莎、格瑞及罗斯伯格对9·11小说的批评可以看出,关注家庭、关注个体创伤、以受害者为视角叙述的创伤书写成为早期9·11小说的重要形式,在他们看来这种书写缺乏对后9·11时代美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再现。大部分的9·11小说都采取了以受害者为视角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受害者与恐怖分子成为对立的关系,也即自我与他者是对立的关系。在这样的对立中,小说主题自然难免单调,也难怪9·11小说会招致那么多的批评之声。无疑,美国作家陷入了一种写作的困境。那么,厄普代克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困境呢?

2 跨越边界、消解对立

9·11事件发生后,厄普代克也是首先在《纽约客》上撰文,表达他难以接受该事件的真实性的感受,他说当他从布鲁克林的公寓看到双子塔的倒塌时,觉得是“电视所产生的一种虚假的真实”,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看到第二座塔楼火焰冲天时,我依然觉得这不是真的;那一刻被定格了。”^[15]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厄普代克试图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理解恐怖袭击,认为在面对这一空前的灾难时要保持一种自我距离和自我忘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选择了扬弃的美学方式,美学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形式。他认为,在面对9·11时,“他者”及“他者化”是不可能避免的问题,以抽象意识形态为名的“他者化”可能会使恐怖分子屠杀无辜,“那些成为烈士、寄自己的生活于来世的坚定的人依然会公然挑战并带来大量伤害”^[16]^[28]。从恐怖分子的角度看,他们的自杀行为不是通过灭绝人性的机制证明的,而是通过圣战和自我牺牲的理念来证明。在《恐怖分子》中,厄普代克便把目光投向了艾哈迈德这个美国社会中的“他者”。

9·11之后,恐怖主义是与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厄普代克却想描写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恐怖分子”。而且他的确是怀着同情的心情在描写艾哈迈德,这无疑是一种越界的做法。劳瑞·维克若伊(Laurie Vickroy)从创伤的角度反对这种越界的叙述,认为这种叙述会“促进遗忘,且通过隐私、沉默、否认、理性化及削弱受害者的指控等为自己辩护”^[17]^[19]。9·11的文学再现要更为复杂,因为在恐怖主义的行为中,行凶者或恐怖分子的形象已成为创伤后果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种叙述中,受害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了。9·11恐怖袭击发生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或直接在纽约或间接通过媒体目睹了这场灾难,劫机的恐怖分子已经成为集体创伤中难以抹去的一部分,因此,任何试图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再现9·11的努力都难免会招致非难之声。恐怖分子也通过媒体扩散他们的形象及影响,他们把媒体当作了武器。不断在电视上播放的恐怖袭击画面“绑架了我们的想象”^[18]^[7],成为一种视觉上的主控叙述。“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是每个美国普通民众的问题和困惑,因此,当福厄(Foer)等作家在关注9·11带来的创伤及创伤的后果时,厄普代克则试图想象宗教的动因,在他看来,这才是恐怖行为发生之源。难怪他在访谈中声称,《恐怖分子》是一本关于宗教的书^[19]。厄普代克的“越界”叙事为“被绑架”的叙事提供了一种反叙事形式,成为9·11文化记忆多样性的重要补充。

小说的开篇就引入了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宗教:“魔鬼,艾哈迈德想,这些魔鬼想要夺走我的

上帝。”^{[20]3}艾哈迈德狂热的宗教信仰甚至超越了他的阿訇老师。在他眼中,纽约这个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中心,是“撒旦的心脏”^{[20]293},“西方文化缺乏上帝的存在……因为没有上帝的存在,西方文化痴迷于性和奢侈品”^{[20]38}。他认为身边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正在威胁他的信仰,他把恐怖主义行为看作是安拉的授命,视自我牺牲为受神福佑的伟大壮举。“他们为什么想做那些恐怖的事?他们为什么很恨我们?有什么可恨的?”^{[20]48}小说中国土安全部长的发问不仅反映出9·11后美国社会的恐慌心态,从他的发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与“我们”的对立。在小说的扉页上,厄普代克引用了《圣经·约拿书》中的一段话:“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厄普代克似乎是在有意想说明“他们的”愤怒。这段话暗示着道德正义,包括了基督教神学准则下的宗教差异。这段引文也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弦外之音:小说依然是把犹太-基督传统作为美国社会的宗教及文化形态。

小说人物之间的关联促进情节的发展,艾哈迈德的犹太老师杰克与他母亲特瑞有私情,而杰克妻子的姐姐恰好在国土安全部工作,最终杰克得以及时劝说并阻止了艾哈迈德的恐怖行为。虽然这种情节安排颇似好莱坞的剧本,但小说在叙述上还是独具匠心的。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不断在各不同的人物意识中心中转换,以此避免作者主观性的意见。这种方式的叙述打破了对极端分子或者基地组织分子模式化的刻画,如在描述本土成长的恐怖分子的信仰时,通过艾哈迈德的声音我们知道:“圣战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它意味着斗争,沿着上帝的道路。圣战可以指内心的斗争。”^{[20]149}厄普代克笔下的艾哈迈德不再是9·11后被美国社会“妖魔化”了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模式化形象,而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普通人。在他要去完成自己使命的那天早上,“艾哈迈德感到早饭那个橘子里的液汁和一种被压抑着的紧张的兴奋感挤压着他的膀胱”^{[20]285}。这个恐怖分子被还原成了普通人,他和读者一样,有着其自身缺点和不确定性,“在一阵阵恐惧感与之后一阵阵的兴奋感的间隙,某种简单的感觉确实占据了艾哈迈德的心灵,然后再全部崩溃,回到那种想要结束一切的急不可耐的心态中。”^{[20]251}。这段描写有效地把艾哈迈德还原成了普通人。德里达曾说,“从这个语境上看,那些被称作为‘恐怖分子’的不是‘他者’,不再是我们‘西方人’所能理解的绝对的他者”^{[21]115}。因此,受害者与行凶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

小说以艾哈迈德的“这些魔鬼想要夺走我的上帝”开始,在杰克成功说服艾哈迈德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之后,艾哈迈德放弃了他的恐怖袭击计划,他有一种被剥夺了的感觉:“这些魔鬼……已经夺走了我的上帝。”^{[20]310}这里所说的魔鬼,应该也包括他曾经信任的阿訇和查理。显然,艾哈迈德也成了受害者,他是9·11后美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受害者,是多元文化中伊斯兰教被模式化、边缘化的受害者,更是被伊斯兰极端分子他的阿訇老师利用、被美国FBI卧底查理利用的受害者。艾哈迈德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本身在这里也成了受害者。“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对于扉页上的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他者”的叙述方式似乎消解了二元对立,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在小说的结尾,当杰克成功说服艾哈迈德放弃他的恐怖主义袭击行为后,杰克也同时成功地成为小说的英雄人物,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主人公,因此杰克的主体性得以构建,且与此同时又建构了一个“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因为杰克代表的是希伯来-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及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3 主体性建构中的二元对立

根据列维纳斯的观点,“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无法通过同感来获得;“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共在”,因为“共在”关注的只是“此在”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真正探讨存在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神秘的关系。“他者”处于“自我”的理解之外,无法为“自我”的思想所掌握。真正的主体性是由“他者”所建构的,“自我”的“主观性、心理现象都消极地为他人而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伦理关系^[22]。《恐怖分子》中的杰克与艾哈迈德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首先出现在读者眼中的杰克是一个完美父亲和丈夫的形象,“他靠工作抚养那个孩子……;他靠工作作为马克提供现代文明要求其必须拥有的一切虚化俗气的垃圾,以便他能混入同类;现在杰克·列维仅剩的任务就是去死,为这个超载的星球贡献一小块空间,一小块呼吸的场所。”^{[20]20}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杰克并非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物,而是一个他自己所说的“拖累”,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希望,他似乎并非一个值得敬重的父亲,甚至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也不是一个恪守教规的犹太人。小说结尾时他与艾哈迈德的谈话揭示出一个离散犹太人的现实生活:“我迷恋的女人把我甩了,工作无聊至极……我老婆……看到我那么不高兴,就把责任归为她自己胖得走了形,就开始了速成节食减肥……。我们唯一的孩子马克……只想忘掉我们。”^{[20]303}夜里无法入睡的杰克关注的是他自己的死亡及去死的意愿,他憎恨消费主义,讨厌他妻子的肥胖,对自己的生活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他行走在自己孤独的深渊中,一如历史上到处流浪的犹太人。他期望以一种甜蜜的死亡结束这种生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认为消费主义已经桎梏了人们生活的厌世者,最终却成为把自己隔离于该生活之外的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的拯救者。

如果说艾哈迈德代表的是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他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话,那么杰克显然代表的就是美国社会中的“我们”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艾哈迈德在驾车驶入林肯隧道后进入一片黑暗之中,而先知般的杰克却引领着艾哈迈德走出了黑暗,走进了隧道外的阳光之中。而通过阻止艾哈迈德的恐怖袭击行为,杰克还帮助艾哈迈德获得了一种自由。加入原教旨主义组织后,阿拉伯穆斯林就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转向集体的信仰和信条。艾哈迈德对其组织的极端主义教义深信不疑,他是作为其组织的代表去完成恐怖主义袭击的使命,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本身。放弃恐怖主义袭击的任务是他第一次基于自己的自由意愿而做出的决定。艾哈迈德复得了他的自我意识,复得了被集体独裁所压制的自由,而这一切是由于杰克的帮助,杰克把他从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唤醒他并把带进自由的现实。但是,挣脱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的束缚获得自由的艾哈迈德又陷入了另一种被束缚的状态之中:他让自己成为了杰克的殖民对象。根据赛义德(Edward Said)的观点,西方加于东方的不平等性同时也构建了西方的优越性,因此,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身份都是一种构建,这种构建涉及“他者”的构建,而“他者”的实际状况是它要屈从于他们与“我们”之间不断被反复阐释的差异。通过对犹太人杰克及艾哈迈德和他的阿訇老师拉希德的刻画,厄普代克展现出西方/东方、我们/他们这个新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在这个二元对立中,杰克代表的是积极的、民主的、现代的和文明的西方,而阿訇拉希德及艾哈迈德代表的则是被动的、反民主、反现代的东方。

厄普代克在小说中把阿訇和杰克都刻画成艾哈迈德的父亲形象。自幼起,艾哈迈德精神上的父亲就是拉希德,他是艾哈迈德的父亲、保护者,同时也是他的精神领袖。而作为高中辅导员身份的杰克,虽然认识艾哈迈德的时间不长,却关心他的未来,并决意与艾哈迈德一起去死。与此作为强烈对比的是拉希德,他明知查理已被处死,依然执意看着艾哈迈德独自去完成他的使命。尽管艾哈迈德一直在被他身边的穆斯林所控制操纵,却是从杰克这里得到了真正的爱和保护。根据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观点,殖民者自身没有其身份之源,也没有固定的身份,而是差异性的。他把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权力并非完全为殖民者所有,被殖民的“他者”也并非是完全无力和被动的”^[22]。在这种对立的过程中,通过艾哈迈德这个“他者”形象的构建,杰克的主体身份也得到了构建。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写作的困境,也道出了文化批判要面对物化、集权化世界的复杂性。厄普代克试图以同情恐怖主义分子的“他者”艾哈迈德的叙述方式走出后9·11时代美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困境,力图消解受害者与行凶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但他自身的政治及宗教意识形态却使他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二十二条军规”:对“他者”的同情构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自我”。但他的写作困境本身恰恰表现出9·11之后美国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维特根斯坦说,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上,我们居然还能够活着,这本身就是奇迹,就是美。因此,写诗依然是走出“奥斯维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Caldwell G. Gods and Monsters in Terrorist [ED/OL]. The Boston Globe, 06 /04 /2006. http://www.boston.com/ae/books/articles/2006/06/04/gods_and_monsters/?_page=full.
- [2] Donohue D. Updike Makes a Surprising Turn in “Terrorist” [N]. USA Today, 2006 -6 -4.
- [3] Raban, Jonathan. The Good Soldier [ED/O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3, 2006. www.nybooks.com/article/19132.
- [4] Kakutani M. John Updike’s “Terrorist” Imagines a Homegrown Threat to Homeland Security [ED/OL]. The New York Times,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6/06/books/06kaku.html>.
- [5] Duryea B. Updike’s Take on “Terrorism” [N]. St. Petersburg Times, 2006 -6 -4.
- [6] Hitchens C. No Way [J]. The Atlantic Monthly, (8): 114 -117.
- [7] Breithaupt, Fritz. Rituals of Trauma: How the Media Fabricated September 11 [C]//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September 11. Chermak, Bailey, and Brown.
- [8] Auster, Paul. Random Notes September 2001, 4:00 P. M. ; Underground [C]// 110 Stories. New York Writers After September 11. Ed. Ulrich Baer.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 [9] Wyatt, Edward. 9/11. Fact meets Fiction [ED/OL]. The Age March 19, 2005. <http://24www.theage.com.au/news/Books/911-fact-meets-fiction/2005/03/18/1110913752579.html>.
- [10] McEwan, Ian. Only Love and Then Oblivion. Love Was All They Had to Set Against Their Murderers [ED/OL].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5, 2001. <http://www.guardian.co.uk/wtccrash/story/0,1300,552408,00.html>.
- [11] Rothberg, Michael. “There Is No Poetry in This”: Writing, Trauma, and Home [C]// Trauma at Home: After 9/11. edited by Judith Greenberg,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 [12] Mishara, Pankaj. The End of Innocence The Guardian [J]. Saturday Review, 2007 (May 19) :4 -8.
- [13] Gray, Richard. Open Doors, Closed Minds: American Prose Writing at a Time of Crisis [J].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09, 21 (1) :129 -150.
- [14] Rothberg, Michael. A Failure of the Imagination: Diagnosing the Post -9/11 Novel: A Response to Richard Gray [J].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09, 21 (1) :129 -150.
- [15] Updike, John. Talk of the Town [N]. New Yorker, 2001 -9 -24.
- [16] Updike, John. Tuesday, and After [N]. New Yorker, 2001 -9 -24.
- [17] Vickroy, 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M].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2002.
- [18] Baer, Ulrich, ed. 110 Stories: New York Writers After September 11 [C]. New York: New York UP, 2002.
- [19] Updike, John. John Updike Explores Arab Immigrant Culture [ED/OL]. National Public Radio. Interview by Steve Inskeep. 13 Jun. 2006. 14 Mar. 2011. <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479128&ft=1&ft=5482086.
- [20] Updike, John. Terrorist [M]. London: Hamilton, 2006.
- [21] Borradori, Giovanna, ed.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u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C]//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3.
- [22] 胡亚敏, 肖祥. “他者”的多副面孔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 (4) :166 -172.

(责任校对 龙四清)